

文史資料選輯

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印

1960年4月

目 录

旧 事 今 忆 魏伯祺 (1)

关于全浙公会的一些情况

談談陈其美

談談張靜江

孙中山先生创办上海民权报的经过 張其麟 (8)

苏联十月革命后我国派往苏联去的

第一个外交使节 葛祖兰 (9)

蒋介石做伪总统的一个片断 胡次敏 (12)

参加反蒋事变经过 張义繩 (16)

关于1924年福建政变和齐卢战争的纪实

旧时中国海关的制度和

海关职员待遇的不平等 徐海屏 (25)

中华化学工业会简史.....陈世璋 (27)

康有为脱险记.....林秋斯 (31)

商务印书馆开办之初.....張季慈 (32)

旧 事 今 忆

魏 伯 慎

关于全浙公会的一些情况

全浙公会主持人褚輔成(号慰庵)是浙江嘉兴人。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成立了国会，当时褚担任众议院议长，许多浙江议员都捧他。当时议员每个月的公费是五百元，去北京开会不够用，经褚輔成出面交涉，浙江省长答应定期补贴。在国会解散时，褚还领到了一笔补贴，没有分配，就用来成立了以浙江籍的国会议员为主体的全浙公会，自己担任了会长。当时我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方面，王曉頌在绍兴旅沪同乡会方面都是中心人物，虽不是国会议员，褚輔成却找我们参加，担任副会长，为的要壮大声势。当时，每逢浙江有重要事情，我们就以公会名义写信或打电报给浙江省长，发表主张。

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与孙传芳(当时任苏、浙、皖、閩、贛五省联军司令)的部队发生接触。当时全浙公会倡议“保存东南”“东南和平”，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绅商纷纷附和，蒋介石看到上海有这个组织，就派顾群、何成濬为代表，来沪联系，并且写信给我和褚輔成，要我们把锣鼓敲得响一些。我们公会开会后，就把锣鼓敲得更响，分别打电报给孙传芳和蒋介石，提议双方不要打，要安民，派代表谈判。并对孙表示：既然主张保境安民就不要动手。孙说：这都是蒋介石不打过来的，所以我才动手。我们就决定派代表五人去进行交涉，这五个人是我和浙江蔣百里(尊簋)、江苏張一鵬、赵正平、福建史家麟。在出发以前，全浙公会就打电报去南京、武汉，并派王曉頌去广东联系。到了孙传芳处，孙请我们吃饭，蔣百里也出来招待。孙说：“蒋介石不堪一击，为了保境安民，我们在许多地方

紅他，最好他不要來打。”飯後我們就前往漢口，在下船時孫又派了葛敬恩和一個姓徐的參謀長一起去漢口。由於全浙公會已經去電報給蔣介石，所以到了漢口就有人來接，在棧房裡住下來。我們去見了鄧演達和陳公博，他們說蔣介石已去前方，由他們代表談判，談妥後會送我們去見他。他們又問我們上海人民有些什麼意見，孫傳芳怎麼說？在分別談話後，他們表示要把這些意見傳達給蔣介石後再作答復，這是第一天的情況。我們在漢口住了幾天未見下文（估計蔣介石就利用這個時機進行軍事工作），張一鵬因為母親病重臨時返回蘇州。孫傳芳一再打電報來詢問聯繫台案，我們無法回復。蔣伯璣和我商量怎麼辦，他和蔣伯璣交情很好，感到這樣下去就不行了，他建議離開漢口，他由南昌走，我們從湖南、江西方面走，這樣分兩路走，可能遇到蔣介石。蔣伯璣走後，我們仍然住在漢口，有一天夜里鄧演達和陳公博告訴我們說蔣介石要我們到前線去談話。十一月一日北伐軍打進了武昌，我們在漢口和陳銘樞一同進城，過了幾天，由陳派了一個政治聯絡員和兩個勤務兵送我們去內地，先從長沙到陳銘樞的萍鄉，又碰到鄧演達派來的一個政治聯絡員和兩個勤務兵，這時（有我和葛敬恩兩人繼續前去，其餘的人又住下來了。我們走了十天路程，到了江西高安，沿路就搞到了離南昌五六十里路的奉新地方，蔣介石派來迎接的人，我和葛敬恩就住下來。在那里我們看到了趙雲龍飛來的飛機，也吃了趙雲龍所吃的大菜，但不好吃。次日，蔣介石分別找我和葛敬恩談話。當時葛敬恩是陳儀（孫傳芳部下的師長）的參謀長。蔣介石問他：孫傳芳到底有多少炮（因為蔣當時沒有炮），九江到南昌（當時孫的行營在九江，蔣介石正在進攻這一帶）的炮位情況怎樣？我想葛敬恩對蔣介石一定是告訴了大概。蔣介石告訴我說蔣伯璣已經來過，由於他等得時間長，已經把他從贛路送回去了，後來孫傳芳方面又不能不說是葛敬恩和蔣介石爭奪地方。蔣又說他將從湖南到江

西來費了很多時間，回去時可以走另一條路。我說從這裡到南昌去一天就可以到了。蔣說你們出來不容易，可以玩玩，他派轎子送我回去。事後，據我了解，蔣伯器回去時很高興，以為可以不打了，可以實現“保境安民”了，他回到南昌時，孫傳芳親自來接，準備坐火車從南昌回九江開會，蔣介石就利用這個時機，選擇了沒有炮位的馬迴嶺地區打進去，上面并用飛機轰炸，孫傳芳幸而逃得快，他的專車卻被打壞了。南昌、九江一線就此截斷，在這情況下，九江就扯了白旗。可見蔣所以要我們多玩幾天，也是別有用心的。孫傳芳打敗後，我們由田漢口到九江看到了一切從此就到了上海，向全浙公會報告了經過情況，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由於這次全浙公會的主張不健，起了作用，蔣介石就又給我們一個政治任務，在當年（1926年）下半年派人來扶系，要我們去浙江。當時不少知名之士如蔡元培、馬敘倫（夷初）、蔣夢麟、褚輔成、沈鈞儒等十几位都參加了，其中有幾位是中共黨員。這時已是民國十五年年底，我們商量了一下，考慮到北伐軍即將來到，在寧波方面已經沒有孫傳芳的勢力，就決定先到寧波成立臨時省政府。那時從上海到寧波也不穩當，蔡元培等寫文章打電報是能手，但對成立臨時省政府沒有做過，感到害怕，他對我說：你的胆子大，又是寧波人，到寧波去好了。下船時我們扮做水手，到寧波後住在城里我家中，預先派人布置借了一所學校成立省政府，貼出布告，由褚輔成擔任臨時主席，剛剛成立兩個小時，曹娥方面來報告，北伐軍被孫傳芳開炮打垮退下來了，我們馬上各奔前程逃走，幸而孫傳芳當時還寬大，沒有追殺。1927年2月，北伐軍真打過來了，浙江孫傳芳的隊伍也變過來，上面又來催我去浙江成立省政府。當時蔣介石來文確定浙江省主席由張靜江擔任，在張未到任以前由褚輔成代理。我到杭州後連夜在省政府辦公，組織了四個科，褚輔成

兼民政科，我担任司法科，沈鈞儒担任秘书长，在浙江省行政委员会委员中有几个中共党员（这是蒋介石交張群帶信介紹来的，由褚輔成和他們联系），报上去后情况不好，說褚輔成与中共关系密切，对張靜江不理。这时从武汉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了清党，发生了“四·一二”事件約在三月廿八或廿九日，何应欽（当时担任前敌总指挥）来到浙江后，請褚輔成、沈鈞儒談話，以后他們二人就不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既去看何应欽，何說：这两天开会忙，我打聽兩位休息几天，你們不安坐。我覺得情况不对，并认为何应欽没有这样大的权力，出来后一商量，过了几天我就去南京問蔣介石。在杭州时听说褚輔成被扣留的原因是由于褚在日記中写出与中共有关系，我想这当初是蔣介紹給我們的，如果不談关系，拿到应就关照，为什么现在这样做呢，我心中不平。到南京蔣的办公处，在楼下看到了陈布雷，陈說蔣介石很忙，沒有工夫，不准备見客。我想上楼，被卫兵拦住，正好这时蔡元培从外面进来他也說不要見吧，我說要問問清楚，就自动走向前跑上几步，蔡怕卫兵开枪起来拉我，失足跌了一交，我覺得对不起他，就跑了。我回到杭州省政府已改組把交卸事务办妥后，就回上海做律師。事后得悉褚輔成和沈鈞儒被关押了半年无京后才被釋放出来。

談 談 陳 其 美

陳其美湖州人，宅比我長二歲。我原名炯，浙江鄞縣人，今年八十一歲，我在日本認識他，我與他都是為了學習警察而去日本的。我到日本在1906年（即清末丙午）三四月間，因駐日公使館的介紹，進入東京警監學校第三班，用翻譯二年畢業，但其美已比我早兩月進入該校第三班了。學校是新办的，并无寄宿舍，學生只得租住民房，我們因住房毗連，過從較密。他與另一同學即與我同住一房的莊之璵更為友善（莊與其美同班），自此我們三人，便無話不談了。其時清廷宣布預備立憲，排比新政項目，分九年進行，而警察必須在幾年之內辦理完竣，所以清政府已于先一年以官費派員來日本學習警察。但日本并无警察學校，乃由駐日公使向日本教育部商經大學代為設校，因而有用翻譯教讀一年畢業的警務學校出現（民初任眾議院院長的趙爾巽成參議院院長的王家驊都是這個學校畢業的）。後來因學習警察的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又以一年的時間太短，乃由駐日公使再度商請办起這個二年畢業警監學校（警是警察，監就是監獄，那時各省牢監均办得比較腐敗，若要立憲，非把監獄一起办好不可，東京警監學校用警監兩字的原意，就在于此），我與莊之璵（琴化人）年齡比較大一些，在星期日同鄉往往連袂前來談天，房中談客常滿。蔣介石也是一個，這時他名叫志清，还未收用介石。陳其美以詩是學隨筆（這時學隨筆有限制非常難），另眼相看，倍加親密，因此陳蔣二人，也如同大兄小弟了。次年1907年某月，其美忽以警監學校學生已達八百人之多，每日學費五元，收入共四千元，而大學老

教員到校授課者少，挂名的多，與升學時所標榜的某大學某著名教師教什麼的宣傳品不符，與學校辦學人爭論起來；爭論到激烈時候，其美便以“只知圖利自己罔顧學生學業”為理由，印發傳單，要求同學同意，利用日本學派分設，另辦一只東斌學校。東斌課目與督監同，而教員大部分可能是五大學頭等教授。我以督監是我國駐日公使與日方教育部商辦的，學生官費居多，官費都是內地政府指定的，不能輕易改變，而且督監的校方竟學生要辦新校，已自己轉園，允許添聘幾位名教師以滿足學生的慾望，當時立勸其美珍此下台。但其美堅持必辦新校，莊之璠附和之。後來東斌的牌子雖然豎立起來，但東斌的辦學人，那里請得到這許多好教師，結果跟其美等由督監轉到東斌的同學只好提前畢業，辦理結束。莊之璠在東斌畢業，其美則早已离校回國。以上是他留東時期的情況。

其次，我要談談其美怎樣收服應桂馨的。應與我同縣，也是鄞縣人，但他家是鄞縣西鄉密岩，距城有一百數十里之遙。他的父親叫應文生，在上海做石匠作頭發了財，在鄉下建築了新屋，其時清政府提倡辦學，其子桂馨，就辦起學校來了。

他的辦學，據說是把他家前後左右民房民田划作校舍或操場為借口，統統佔用。其最使人注目的事，是在屋外砌起了高大的照牆（據說在前清須要大官告老還鄉，方能砌這牆的），牆是黃色的，而桂馨自己養了好多只馬匹，每日騎馬試劍，因此觸犯了眾怒，鄉下人便聯合起來稟告到縣到府。寧波的府教育會，那時是教育部門的最高權力機關，派員調查屬實，就把這個學校（學校叫什麼名稱已忘了）立即勒令封閉。桂馨向縣府求直，而縣府早已與府教育會結系，無狀不駁。在封閉的學校裏被封閉，而所有教師如歷史地理教師外，還有体操教師音樂教師尚未解散，天天在它的家裏開會想辦法，而桂馨自己則跑

到上海，不知由誰的介紹晤見了陳其美。那時其美正在開勞，碰到這有錢可利用的機會，見了程潛，就滿口答應代為翻案。

閱日，其美便到寧波來辦這案了，他探得我已由日本回國，便趁寧波輪到甬，很早就向我家敲門。我見他身穿白紡綢西裝，打扮得很漂亮，詢問來由，他說：“為調查應桂馨案而來，只要你陪我到某機關去見某人就是了。”我也不知應桂馨為何種樣人，只好唯唯。早點后，一同往訪縣教育會、府教育會以及寧波府中學堂負責人，他每到一次便和該處負責人大大聲爭辯，我只聽得說“這是我們寧波人的事，你是湖州人，與他何干，請你去管管湖州的事好了”，大家不歡而散。他到嵒岩親自調查半回申，其時寧波輪船章棹下午四時半升船，我送了他下船以後，回家時，發現有“學生陳其美署名的稟浙江聯合電讀的傳單”并悉各學校各機關都發現同樣傳單。可想他事先就有布置，其指詞无非罵教育會偏听、武斷、摧殘教育等等。而甬人却都以為陳其美有神經病，多管閒事。次早浙撫遽然據學生陳其美電稟行文，電寧波府知府徹查稟復，一時傳為奇話。自此以後，應桂馨便一直同其美做秘密工作了。1913年，袁世凱以宋教仁為國民黨優秀人物，忿為國務總理趙秉鈞收買洪述祖、應桂馨、武士英，刺殺宋教仁於上海火車站，事後這几位謀刺功臣再度被袁世凱謀殺滅口；袁的惡毒手段，于此完全暴露。據說武士英是由應桂馨收買而來的，所以應桂馨所得金錢酬報比較大，這也陳其美所能預料？

我在辛亥年暑假中，曾來上海與陳其美和莊之璵談過秘密，但那時莊之璵已移住杭州了，這年上海是九月十四日光復的，寧波在十五日光復，而杭州反比寧波后一天，是十六日光復的。陳其美做了江蘇都督以後，我為了購辦軍衣又到過上海同他談話，宅約我在夜里十二時半相見，不料待至三時才露面。宅贈我德國貨小手槍十二支，要我結束寧波事務，來擔任上海警察局長職務，我以上海情形不熟婉復之，宅就改請周駿彥

担任(周亦哲同学,后来做浙江盐运使)大约三五个后,另派卢
鍾猷接办。卢鍾猷入,过去曾与徐錫麟一起在安庆謀刺恩銘,但被逮
出来遇害,后做众议院议员,也是警监学校的同学。

其美有手段、能交际,但缺少武力。黄膺白(鄂)为他策划。首
先派張群(甘肃)为一团团长,着蒋介石派赴宁波招兵募兵,并任为
第二团团长(这团是四个营,其第一营营长是王柏龄)。同时另外
了一支别动队,叫做光复軍,是由李征五领导的,光复軍内有关外
来参加的李宗昌队伍(李宁波海小港人,大族七兄弟,宅居第五,
人都叫他五老板)。

陈其美最喜发傳单,在日发过一次,在宁波也发过一次,任警
督后,则收发通電。一般说来,他的通電特别多,到通電无灵,即二
次革命失败时,他便向同志们避往日本去了。

談 談 張 靜 江

張靜江講話有的时候是很奇特的，我在寫張靜江講話之前，先來寫一些瑣碎小事以及與他認識的過程。

張靜江是赫赫有名的湖州南潯張家的子弟，張家是做鹽商的（從前鹽商本客是大商人）。他行二，所以人都稱為張老二，一度做過販運中國古董去外國賣買的販運商，因而認識了孫中山，亦曾資助孫中山的錢。寧波人開鳳祥銀樓的趙菊椒（即杭州市長趙志游之父）也做外國生意，也傾心孫中山學說，與張靜江為同志，趙菊椒是八兄弟，他行六，寧波人都曉得他是六先生。其八弟趙林士，從少就談革命，到日本留學後，更為積極，林士與我素相友善，一直到辛亥革命辦交易所病死為止。林士早已認識了張靜江，我因林士而亦認識張靜江。到1918年1919年之間，張靜江、戴季陶、蔣介石等要辦交易所時，主張邀我參加秘密的就是趙林士，這裡所謂秘密，還是外國的秘密；其內里的秘密依舊非我所能參與。

後來在交易所里做投機賣買，張靜江有張靜江的一套，趙林士有趙林士的一套，蔣介石、戴季陶也有一套，我們也有一套，各不相侔。其實都以賣買的對方為敵人，如我買進是希望漲價的，對方賣出人如為張靜江或蔣介石，他是希望跌價的，如價跌再買進，不是已賺了錢么，反之如賣出人賣出之後價不跌，買進人買進以後價不漲，均因對方勝利地達到目的而使我歸於失敗之故，朝朝暗鬥，久則兩傷，整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失敗，其原因就在這裡。

我与虞洽卿、赵林士、盛丕华都是交易所出面的理事，而张静江则是秘密组成的交易所最高组织之一员，职权不同，晤见时亦少，只有他的三弟张淡如（大资本家，就是建造南京西路静安别墅的老板，他长于计算，极有计划，他不赞成其二兄大刀阔斧手段来办企业）与我尚称莫逆，虞洽卿在1926年托我向张淡如借银五千元，至1939年盛丕华赴香港去看淡如时，虞才託我还清楚，在未还以前，淡如绝不启齿。交情总归不错了。

张静江的下堂妾（这是旧称呼）白兰英，宁波人，比我小几岁，曾做过娼妓，而见重于静江，由静江纳之为妾。她跟静江做事很多，下堂后情形狼狈，在1924年的时候，住在我律师事务所（白克路）对街，搵了一张搵和柏以维生活，她又能烧几只名菜，等此宣传，宁波人如陈布雷同其兄此怀等文人、墨客常在这里喝酒，我有暇常常也去谈天。某日她谈出一椿奇事来了，那就是张静江平时养食客若干人，经济常不宽裕，有时穷到无脚，什么事都会商量过做出来。一日静江忽说要买船票到宁波去，又说是上育王寺（在宝幢地方）打水陆去，（佛事道场）到了船上，一切具备，连“老板娘娘”也备好了人。过去大寺院的和尚、同妓院里的老鸨是差不多的，其势利有过之而无不及，见到南海张家带了眷属来打水陆，未有不如子女对父母还要孝顺的来招待它们。几天之后静江就把育王寺的一尊观音菩萨全身玉琢的（叫做玉佛）换了假货。和尚那里会晓得，强就从从容容辞别方丈下山，后来就把这玉佛运往外国卖了重价翻分。据说至若干时日，育王寺方丈方才发现玉佛变了样，明知是张静江全班人马所做，但他们也是以玉佛号召香客的，始终不敢声张，所以知者不多，这是白兰英亲口向我说的。

以下我是接写张静江和我的谈话了。

1927年4月，在四一二政變后不多几天，張靜江到杭州来做浙江省省長，其先的浙江省政府是由褚輔成代主任兼民政，我任司法，沈鈞儒任秘書長的，四一二政變前几天，褚輔成、沈鈞儒忽被何應欽邀請談話而扣留在行營里（行營在杭州），我向几个省委要求釋回，何說：“褚沈兩君近日辦事辦得太辛苦了，留他在这里休息休息，并無他事，請放心。”我因此便去南京找蔣介石，不料蔣也怪我，拒不我見，陳布雷上樓跑了二次无效，扶梯上站滿了卫队，蔡元培再三說：“你有話我可代達”，我說“他（指蔣介石）他在樓上我在樓下）在去年五六月間率北伐軍攻打江西，但是江西是苏浙皖閩贛五省联军总司令孙傳芳所管轄地方，孙当然要还击，其兵力确較北伐軍为强，北伐軍勇气百倍，岂肯示弱，上海全浙公会褚輔成等，为了双方炮火越打越厉害，欲减免人民无故牺牲，乃倡道东南和平，不久蔣介石就派張佐軍何雪竹持亲笔信到上海来，叫我們調子唱得高一些，因为东南是可以和平的，他还介紹共产党员宣中华等几人与我們見面，說是有重要事可與他們商議云云，現在褚輔成在代理省主任的时候，与共产党商議政事，我认为是正大光明的（后来在何應欽方面傳出消息說：“褚等是勾結共产党，謀造反，記在日記簿上。”）它最低限度，也应事先預为通知，才符手續，它那样做，我就要抱不平，所以要与它評理。”我說半就回杭，到杭后才知道省政府已被改組，我也被蔣介石从輕发落，榜上暫不列名。我既然榜上无名，照例应将我所經管的司法部門的文卷和財物等造冊移交繼任人，此时周佩箴（前上海証卷物品交易所常務理事）和周駿彥（前交易所監察人）兩人對我說，新省長張靜江到已几天了，他在傳呼你名，大家都是老朋友，可同往拜訪。及我們見到張靜江时，他开口便說：“伯慎先生你来得正好，我正在找你談話。”我說新省長有何分附，他說：“这次改選，把你名字漏掉了，实在由于匆促之故，这我会把你补进去的，

不必挂怀。”其次他就谈起了省长的新计划来了，說道：“我这次来杭，是想把浙江省搞好，浙省十一府七十五县，除宁波、绍兴、嘉兴、湖州旧四府外，其余七府百姓都很困苦，平均起来，还称是一个穷省分，若要变穷省为富省，必须有新计划才行。”我就問：“然則新省长有无新计划呢？”張省長說：“有！有！”我說請其詳。

他說他帶來新计划，原有三件，即三大政策：（一）××计划（這年代久遠，我完全記不清了，不談。）；（二）水力发电计划，大約是指新安江而言，这事如能办成，浙江全省人口二千五百万，每户五个人平均推称，应为五百万户，每户每月只出三角錢，便可大家点电灯了，而政府每月則可收入百五十万元。至于如何发电的技术問題，經費从何处来，技术員聘請何国人，多少年月会发电，却均未談及；（三）禁毒计划，什么叫禁毒，就是“禁鴉片”，說到這里，他精神焕发地說：“这就要請你帮我忙了，据我所調查，浙省吸毒的大約有八十万人，每月每人必化費三五元至十来元来过瘾，我知道鴉片禁了这許多年数，还未禁絕，不如公开卖买，寓禁于征，其办法是使吸毒人先行登記，有登記執照者方能购买毒物，登記有限制，只許减少，不能增多，登記完毕后，再使逐年递减以至絕密，政府可由此而获巨額的收入，吸毒人在不知不覺之間而可脫离苦海，假如吸毒人每月繳執照費一元，毒物买上銀幣二元，共計三元，每月以八十万人来称，就是二百四十万元，一年就是二千八百八十万元，以此来办各种建設，浙省那有不變穷省为富省！至于毒物卖买，由禁烟局来办，宅可仿交易所办法，設經紀人二百人，划定区域，限价出售，經紀凭照，每人須繳保証金兩万元，二百人可得四百万元，即以此作資本，购买輪船，直接开駛云南出土地方，則办貨物，裝回杭州，而后发交經紀人出售，

一面严查私货，查出立即枪决，谁敢以身试法。”我说这办法的确是新办法，从未听到过，然则这个蔡烟局长还要到云南办货色，人选到很重要的了。他说：“我想这件事就请你来办。”我说：“我曾办过交易所各种章程，办过交易所，但这只是经济性质的工作，如今欲以此经济方法应用到政治上我是不敢尝试的，还是另请高明。”他说：“我做省长，过去也没有做过，我们革命党人，没有做过之事，都要学起来，你何必胆小。”我说：“让我回到上海考虑考虑，再来报名。”这样，我就同两位周同志向他告别了（后来周佩琨是做了农民银行常务理事，周殿春是做了浙江盐运使和财政厅长）。

